

对雪

雪是有智慧的，更是有灵性的，其根源在于“静”。佛说：静能生慧。我说：静能生慧，静能生灵。

文/附属一院胃肠外科 石汉平

2月18日，除夕，美国东部时间16:30，天空如约定般飘起了鹅毛大雪。一周前，美国当地的天气预报说，今天的16:30会下雪，我还半信半疑。

随着漫天的飞雪，湛蓝的天空一下子暗淡了起来，家门口那盏非常明亮的路灯此时变得昏黄隐淡，本来就在5米之内，此时看起来却似百丈之外。不远处的房子消失在视野里，唯有那一盏微光闪烁的孤灯让人知道那就是家的地方。我在担心这个灯如果再暗下去，路上的行人是否可以回家？我的女儿是否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商山风雪壮，游子衣裳单。四望失道路，百忧攒肺肝。”此时，正是国内的大年初一早晨，我忽然想到了万里之遥的父母亲，他们是否也在期待儿女子孙们早一点回家过年？

雪原本是“冷”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理上总与“暖”有关；雪本来是“冰寒”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情感上总与“温情”有关；雪其实是“清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文学上总与“沉酣”有关。人的情感就是这样的奇妙，一方面南辕北辙，一方面浮想联翩。是否是因为生理上感到冷，才更需要心理上的暖？如何暖？喝酒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所以才有喝酒取暖之说。一个人喝酒只能满足生理上的暖，朋友一起喝酒才能够既得到生理上的暖，又得到心理上的暖，后者才称得上“温暖“，而前者只是“暖和”。暖和易获，温暖难求。其实，人最需要的、也最难得到的是”温暖“。风雪催人归，寒冷逼人回。是风雪把人们带回了家，让一家人围炉夜坐、促膝深谈；是寒冷把朋友聚到了一起，把酒当歌，吟诗作对。正是因为有了雪，所以才有了白居易与刘十九的对饮，所以才有了“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此时，再读白居易的诗，仿佛当时就在其中。

我是喜欢雪的，不是因为一个固定不变的理由。儿童时，喜欢雪是因为好玩，多了一个嬉戏的法子，把雪捏成雪球互相往对方的脖子里面塞，一面凉得嗷嗷大叫，一面笑得泪涕四溢。遇上冷冻天，雪水凝结成冰，挂在家家户户的瓦檐下，家乡称它为“凌冰吊”，远看恰如一排排白色钟乳石。用竹杆子把它敲下来，拿在手上吃。那可是我人生的第一支冰棍，而且是真正的冰棍，它的美味是现世间任何一种冰激凌都无法比拟的。青年时，喜欢雪是因为它的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当时，自己已经心有所仪，一直想找一个大雪天向她表达。可是，南方哪来的雪？于是只好借雪喻意，手抄了许多首赞美雪的诗句，表白自己的感情象雪一样纯洁。可惜，花无百日红，雪无百日白！冰雪消融的季节，一切随之而去。到了现在，我仍然喜欢雪。但是，此时遇到下雪，我不再是亢奋地往外跑，去堆雪人，去打雪仗，去滚雪球；去固执地站在野外让大雪把自己变成雪人，让大雪把自己凉透，任凭父母千般呼唤、万分着急，也不回家。此时遇到下雪，我更愿意“坐看青竹变琼枝”，更希望“盖尽人间恶路歧”。不用父母叫喊，不用家人操心，自己自觉地、乖乖地回家，仿佛下雪就是回家的命令。

记忆中好多年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雪了。实际上去年春节期间（年二十九）也下过一场雪的，但是除了我们一家人出去铲雪清路、拍照外，没有留下其它的记忆。上一次关于雪的深刻记忆是1999年，当时我住在Baltimore的Calvert Street 2604号。由于下雪，学校关门，我们不用上班。于是几个朋友相约一起出去赏雪。地点就在Charles Street西边，Johns Hopkins大学Homewood校区正前方的公园里。公园的名字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里面有Lee将军的铜像，方明、孙兆黎，卞策、袁瑄、张宗德、侯志鹏等朋友一起在Lee将军铜像前堆雪人，当年的雪非常厚，我们堆的雪人几乎和我们一样高，大家高兴地合影留念。彼时我们几个人都是学生，大家住得非常近，所以经常在一起聚会。雪天就是最佳的聚会时机。那年的大雪融化后，慢慢地大家安了家，住地隔远了，聚会也就少了，从此再也没有堆过雪人。回忆，也许是最美好的。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多美好，而是因为那个美好的时候是雪带给我的……。

雪夜，我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书房里，考虑如何为《中国肿瘤营养治疗指南》写一个前言？它是一本虽然很小，但却很大的书。小是因为字数少，只有11万字；大是因为意义重要，它是国际上第一本肿瘤营养治疗指南专著。为它写一个前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我冥思苦想、绞尽脑汁还是不知道写什么？夜深了，四周静得象原始森林，静得可以听见落雪；窗外一片漆黑，远方偶尔闪过的汽车灯光，让我意识到思维的搏动。我毫无睡意，仍然沉浸在雪后的兴奋之中。突然间，我有了灵感，渐渐地，我有了思路。我赶紧用几个主题词一样的文字，把灵感与思路记录下来，怕的是一会儿忘记了。很快，十几分钟，前言的架子就搭起来了，随后就是添砖加瓦。凌晨4时，一篇科学与艺术并存、理性与情怀同在的前言——“远帆的航标”顺利完成。2400余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好一个雪夜。

雪是有智慧的，更是有灵性的，其根源在于“静”。佛说：静能生慧。我说：静能生慧，静能生灵。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写道：“Very quietly I take my leave, As quietly as I came here.”雪就是这样，静静地，我走了；正如我，静静地来。每当残叶遍地，每当尘埃漫天，每当枯渴难忍，雪，静静的来了，不用闪电，不需雷鸣，静静地澄清玉宇，静静地美化大地，静静地滋润万物；给世间一个清新的冬天，给大地一个生发的潜导。新春伊始之际，雪，悄然离去，将惜别的眼泪化为汪汪春水，滋润出生命的绿，滋润出生命的红。万象更新之时，雪，潸然泪下，将不舍的泪水变成涓涓溪流，无声地流淌，不带走一片云彩，不留下一丝痕迹。给大地以春暖花开，姹紫嫣红；给人们以依依不舍，悟道启迪。“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相对于雪，泰戈尔的云淡风轻仍然逊色不少！

好一场雪，及时地落在了除夕夜，辞旧迎新，瑞兆吉祥！

好一场雪，深深地落到了我的心里，洗净了我的脑海，滋润着我的心田。

2015年2月21日1:57于美国Chapel Hill

忆尼泊尔义诊

文/肿瘤防治中心泌尿科 周芳坚

他们说话的声音在观看完我们表演的手术后不知不觉地低下来的时候，那些尼泊尔泌尿外科的"长老们"脸色也开始变了。但此时我感到头晕，而且有些反胃，像是病来了。



作者（正中）在尼泊尔进行外伤性后尿道狭窄修补术

近日接到Sanjay医生会诊的邮件，这让我回想起2005年1月18日初次去尼泊尔义诊的事情。

早在2004年5月份，在郑州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办的学术会议上我受邀表演了一台改良根治性膀胱切除+回肠原位新膀胱手术。会后一位叫Sanjay的尼泊尔留学生找到我，用勉强的中文问我，他博士毕业后能不能到我所在的医院学习一段时间，能不能将根治性膀胱切除+回肠原位新膀胱手术学到手。我问他，他们国家泌尿外科领域中哪种疾病最多，他说是泌尿系结石。我告诉他，不要跟我学根治性膀胱切除+回肠原位新膀胱手术，这个手术太复杂、并发症很多、风险很大，病例少的话需要漫长的时间长才可能达到熟练的程度，而且需要一个团队和大医院的平台才能做；我建议他学习经皮肾镜取石手术，因为这个手术比较单纯，一个人可独立完成，结石病人多，可在短时间内做大量病例而积累丰富的经验。没有想到，他真听从了我的建议，更让我惊讶的是，短短几年后他竟然成了尼泊尔最优秀的、最年轻的、和最出名的经皮肾镜取石的泌尿外科医生，现在每年他利用经皮肾镜取石技术为1000多例结石病人解除痛苦！

（一）

2005年1月我和广州医学院微创外科中心的曾国华教授接到了来自尼泊尔Dulehkel医院的邀请，去讲学和手术演示。Dulehkel医院是Sanjay医生从中国留学回国后供职的医院，我们知道这是他促成的事情。那家医院尽管是加德满都大学（尼泊尔最好的大学）的教学医院，位于离加德满都市25公里以外的Dulehkel区，是尼泊尔接受国外捐助最多的半慈善性质的医院，有很好的医疗设备，包括CT和C臂X光影像系统，但从未施行过经皮肾镜取石手术。

费了很多周折，我们将经皮肾镜取石手术用的器械打包随行，经香港飞行5个多小时后，比预计晚了一个小时在当地时间晚上九点钟到达了加德满都机场。晚上的加德满都机场很冷清，没有廊桥，下着大雨，气温很低，带着凉意的风一阵阵迎面吹来，将一路的劳顿与困乏一扫而光。Sanjay医生接到我们后立即驱车赶路。但好事多磨，走了不到一公里，装行李和器械的车爆胎，只好叫来另外一部出租车，耽搁了不少时间。我们坐在Sanjay医生自己开的车上。他车技好得很，开的飞快，发动机声音很大。我想一定是上坡路，将油门踩到底才会这样。后来白天再经过这条路，确实一直是坡道。很多急拐弯，让人想吐。我要求Sanjay开慢一点，他抱歉地说，必须在晚上10点之前赶到入住的酒店，因为现在正在实施“curfew”，当时不清楚“curfew”就是宵禁，其实知道了“curfew”就是宵禁，我们这代人也不明白什么是宵禁。当时尼泊尔还是君主立宪制王国，皇宫发生血案没有多久，游击队正在加德满都以外的地方活动，试图推翻君主立宪制建立民主国家。为了防范游击队的袭击，每到晚上10点便实施宵禁。一路经过了架有机枪的3个关卡，士兵们持冲锋枪查车。可能是穿戴和皮肤颜色与他们心目中的游击队员相差甚远，Sanjay医生简单说明后，士兵们只朝车里望一眼便让我们通过了。10点差5分到达入住的Dulehkel Resort酒店时，我们绷紧的神经才松了下来。

（二）

清晨，肆无忌惮的乌鸦将我们从睡梦中吵醒，推开窗户一看，外面是层层薄雾，原来酒店建在高高的山坡上，放眼望去，远方群山延绵，后来才知道那是喜马拉雅山的西面，山顶边际的云彩呈现出耀眼的猩红色，那是初升太阳的光芒在努力冲破云层的阻隔，山峰的背阳面仍然还是模模糊糊一片阴暗；带着来自印度洋厚重湿气的晨风不断驱赶着山间的雾气与山顶的云层，使得山里早晨的景色变换不断。这景象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

8点钟我们在医院的会议室开始作学术讲演，来了大约15个医生，年纪都长我们不小，后来才知道那是全尼泊尔泌尿外科医生的一半。我要讲的是浸润性膀胱癌的手术治疗，课件中有很多手术图片，文件很大，在那台不知是否经常使用的台式电脑上没法打开来，没法讲。曾国华教授讲经皮肾镜取石手术。从他们的表情看，对于中国式的微通道经皮肾镜取石技术显然一无所知。从他们怀疑的眼光，他们并不相信眼前的年轻中国医生（当年曾教授30岁出头）真的能做到他所讲的。后来才知道，尼泊尔当时只有一个医生做经皮肾镜取石手术，采用的是标准肾镜技术。此前只有为数不多的欧洲医生来这家医院表演过手术，中国医生来这里讲课和表演手术还是第一次。在尼泊尔没有像我和曾国华这么年轻的医生可以独立执业的，更不用说出外表演手术了。

（三）

九点钟去手术室表演手术。更衣室小得有点可怜，三个人进去就拥挤不堪了，而且很冷，动作不快点非感冒不可。更衣后院长很客气地将我们迎进手术室中的休息室。休息室宽敞简洁，烧制的深红色墙砖，给人毫不掩饰的温暖与热烈，用完一杯味道很不错的咖啡后，直奔手术间。令我没想到的是手术间很现代化，几乎现代化手术室该有的设备都有了，就连C臂X光机和手术影视系统这些当时很昂贵的东西都有好几套，要知道这里可是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一个乡间医院，有如我1998年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医学院手术室中的那种感觉。我曾在国内许多医院表演过手术，有些相当规模的三甲医院手术室条件之差，让我为长年工作在那里的医生和护士们感到无比的遗憾。

也许是Sanjay医生故意安排，给曾博士做表演手术的是一例复杂的鹿角型肾结石病人，有过多次开放手术取石的历史，给我安排的手术则是一例经过多次修补手术失败的外伤性后尿道狭窄的病人。在异国他乡众目睽睽之下，初次表演这样的手术多少有些压力，禁不住想起外科学教科书中描述100多年前截肢外科手术的场面。那天还有两位从上海留学回来的尼泊尔医生也来参观手术，显然他们对广州这个城市和这座城市的医生缺乏了解。他们说话的声音在观看完我们表演的手术后不知不觉地低下来的时候，那些尼泊尔泌尿外科的“长老们”脸色也开始变了。但此时我感到头晕，而且有些反胃，像是病来了。

尽管手术有些艰难，但总算顺利，几乎可以说是很完美地结束了。曾博士那台复杂肾结石被取干干净净，一颗不留，还没有什么出血，这给后来的十几台手术带来了良好开端。

给我做后尿道修补手术当助手的是Padi医生，据说他是尼泊尔最老最有权威的泌尿外科专家，起初我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让他那么有威望的老专家给我当助手。后来才知道是他主动要求的。就这个病人，他给人家做了4次手术，都没能将耻骨上的膀胱造瘘管拔掉，7年多来经历4次手术还是一滴尿液也排不出来，病人一直靠带着膀胱造瘘管引流尿液。也许是内疚，也许是想从中国医生那里学点技术，或两者兼而有之。

反复手术加上感染，这个病人的会阴部简直是坚硬如石，刀子切都切不动。手术异常艰难，但3个小时候后还是按预想的完成了。这得益于我在湘雅受到的训练，得感谢培养我的老师们。在泌尿外科领域中最艰难和失败率最高的手术中，外伤性后尿道狭窄（或闭锁）成型（或叫修补）术便是其中之一。在大量成功与失败的实践中，湘雅的老师们总结出了成功的外伤性后尿道狭窄成型术应该遵循的原则：“适当的疤痕切除、满意的对端吻合、通畅引流、和切实的预防感染”。原则是原则，施行起来并不容易，天分和悟性不一样，同样的原则下在不同的医生手中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确按这个原则去做的话，基本上很少失败，问题出在难以做到。我有30多例外伤性后尿道狭窄成型术的经验，没有失败过，但我担心再多做总有一天会出现失败。

后来Sanjay医生告诉我，那个病人手术很成功，终于拔掉了膀胱造瘘管自己排尿。“我没想到今生还能排尿，请一定转告我对中国医生的谢意”，读着Sanjay用E-mail转告病人对我的谢意时，我想起了入门泌尿外科时，有个老师说到骨盆骨折后尿道损伤是人生悲剧的开始（对病人的日常生活、婚姻家庭带来严重影响），一点也不夸张。

（四）

出手术室回到下榻的酒店已快八点钟了，几位“长老”级泌尿外科医生陪我们去吃晚饭。酒店的餐厅极具特色。围坐在烧木炭的大大的火炉旁，一杯浓茶让人疲劳顿消，“感冒”随着一阵微微的热汗云消雾散。那火炉很特别，用红色砖砌成圆形，上方吊着个比炉灶还大的像草帽一样的铜罩，铜罩中央顶端连着通往户外的烟管，这样烧炭的烟被抽到室外，可以享受暖暖的炉火，但感觉不到一丝烟味。至今一想到尼泊尔，首先便是那暖暖的炉火。

“感冒”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那炉火和热茶，是因为酒店比医院的海拔低了100多米，“感冒”其实是高原反应。第二天一进手术室“感冒”又来了。

那天一共做了14台手术，是这家医院开院以来手术最多的一天，也是聚集全尼泊尔泌尿外科医生最多的一天。曾博士做了经皮肾镜碎石取石和输尿管镜碎石取石共10台手术，我作了3例外伤性后尿道狭窄修补术和1例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手术。

这家医院地处山村，院长在欧洲的医院呆过好多年，因此也时不时有些欧洲的医生来这里指导和表演手术，顺便登登喜马拉雅山，领略一下高山地区美丽的风光，但那是一天一台手术而已，哪像中国医生这样，两人一天十几台。君不知欧洲人少，中国人多，中国医生如果像欧洲医生那样，那我们的病人等候手术要等到猴年马月啊。

晚餐气氛如同那炉火一样。尼泊尔的医生们讲了很多话，英文与印度医生很像，至今只记得他们说第二天还会来，至于那些奉承的话就没有印象了，能记得的还有，就是什么菜都带有咖喱味，吃过后肚子胀气很难受；米饭带有一股味道，是稻米经过加工后存放了很长时间、是我们小时候时常能体验到的那种味道。尼泊尔是一个山地国家，能种水稻的田地很少，米饭不是家常便饭。



2014，为了纪念的阅读和超越纪念的阅读

文/历史系 徐坚

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读书，但是任何时空的读书都和周边的图书资源、当时的研究和写作兴趣，甚至突发事件有关。因此，书单只能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记录，保存对那些让我击节赞叹，受益良多、心生向往之意的文字的记忆。

● James M. Skibo and Michael Brian Schiffer, *People and Things: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Material Culture*, Springer, 2009.

人和物的关系就是考古学的核心问题。行为考古学的两位代表人物认为，对现实日常生活中的物是如何被生产、流通和使用的理解是阐释考古学中见到的物的基础。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拿着手机不光打电话，还刷微博、看小说、自拍兼美颜、当导航、当手电、甚至有时当桌子腿垫、当锤子，我们偶尔用手机显摆，毫无疑问还用手机区分人群；物是那么灵动活泼，我们又怎么能忍受，在我们的研究中，物永远是被动地被最直白的因果律和功能论决定的呢？两位作者应声登场，在从古到今的六个个案中，从前哥伦比亚时代的礼制球场到二十世纪的电动汽车，分别展示人和物的关系的不同侧面，干净利落，痛快淋漓。所以，这是本让人不时莞尔一笑，不时击节赞叹，而且常读常新的佳作。为了上课，为了写作，我会不时读上一段。

● James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James Scott早年以“弱者的武器”名扬天下，在中国也拥有大量的拥趸。而这本书讲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弱者的武器”。相对于日常抵制，弱者的另一种选择就是逃离，从平原逃入山地，从种植经济逃到抛荒经济，从等级式社会网络逃到孤立小家庭。这构成了观察中国西南到东南亚山地的另一种视角，James Scott甚至用一个专有名词Zomia指这片地区。最近十余年来，我一直对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山地的文明形态有着强烈的兴趣，在云南楚雄收集到的未经修饰的彝族民族故事提到的苗、彝和汉的关系，我的彝族朋友们视下山到燠热潮湿的广州为畏途，诸如此类都提醒我注意文明的垂直分层分布特征。虽然我不赞同Zomia地区是“无拘无束”的无政府状态，而认为这里可能存在如Stanley Tambiah提出的星云政体那样不同于平地的国家和社会结构形态，但是，我仍然推崇James Scott对Zomia地区不同于平地，“文明”不能上山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下，华南和西南的文明就有可能得到重新解释和评估。

● 白鸟芳郎：《华南文化史研究》，六兴出版，1985年

作为战后日本的汉学领军人物，白鸟芳郎以华南研究著称。白鸟芳郎的“华南”与通常所称“华南”不同，指以广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论文集《华南文化史研究》覆盖自岭南至西南乃至东南亚的广大范围，主题自南诏大理到现代彝族和瑶族，足以代表一时的最高成就。我因近似的研究兴趣和课题而读白鸟芳郎，书中涉及的白族、彝族、瑶族等族群，瑶文文书、铜鼓、华南土司体系等主题，都是我多年来一直关心的。今年系统阅读白鸟芳郎起步于他的另一本贡献巨大，但是读者可能更少的著作《傜人文书》，整个夏天，我都用于以《傜人文书》和Jacque Lemoine的Yao Ceremonial Paintings比对数年前在滇南收集的瑶文文献和图画的工作。

● 平濑礼太：《铜像受难の近代》，吉川弘文馆，2011年

我之前不熟悉平濑礼太的研究，但是，仅看标题就让人眼前一亮。从佛像到僧侣像、军人和政治家像、乃至无名氏或者普通人群像，铜像经历了重要的近代化转型。历史上的造像艺术如何构成铜像的遗产？铜像的兴衰与社会观念的变化是什么关系，尤其是铜像“受难”与社会“祛魅”之间？这个题目不仅对于日本有价值，对于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本书真的起到了他山之石的作用。

● 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在中国史领域，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堪称个人史研究和写作的代表性作品，史识和文采俱备，足以开创风气。沈艾娣选择一个默默无闻，甚至被时代大潮挟卷向前和最终抛弃的乡间儒者为题，他那看似琐碎平淡，抗争无力的一生实是时代和社会的一个特殊投影。这才是微观史的奥妙，如果不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那么微观史就只能是一堆凌乱无序的鸡毛蒜皮。

● 汪宁生：《西南访古卅五年》，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汪宁生：《始信昆仑别有山》，文物出版社，2008年

这是为了纪念的阅读。民族学家、考古学家汪宁生先生于年初去世，而对学人的最好怀念就是重读其充满智慧和温情的文字。汪先生的这两本书只算是众多著述之中的闲适小品。两书皆出自日记，前者是在云南工作三十五年的田野调查日记，后者是出访海外的日记。虽然出版的日记难免因为种种原因有所删节，但是汪先生尽可能地保留了最真实的一面，既有真知灼见，又有真情流露。

● 大出尚子：《“满洲国”博物馆事业の研究》，汲古书院，2014年

大出尚子是日本博物馆史研究的后起之秀，本书是她于2010年提交给筑波大学的同名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顾名思义，本书以1926-1945年间，沈阳（奉天）东三省博物馆，国立博物馆和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建立、发展和最终瓦解为研究主题。时至今日，从“关东都督府”到“满洲国”的研究仍然属于相对敏感的灰色地带。我也清楚地记得去年自己写作关东都督府博物馆的文章时，在沈阳和大连搜索资料的过程中连连碰壁的挫折感，因此，对大出尚子能够终有所成深感敬佩。和大多日本学者的研究一样，本书在选题精准和资料完备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该书以近半篇幅重新“发现”主持国立中央博物馆的藤山一雄，令人耳目一新。其实，“满洲国”的博物馆事业中，国立博物馆和国立中央博物馆仅仅是半壁，在大连的从关东都督府博物馆到旅顺博物馆则是另一半，希望未来有人能有完璧之功。

● 高居翰：《隔江山色》，三联书店，2009年；《江岸送别》，三联书店，2009年；《山外山》，三联书店，2009年；《气势撼人》，三联书店，2009年；《画家生涯》，三联书店，2012年

这是另一场为了纪念的阅读。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尤其是书画研究的巨擘高居翰James Cahill也在年初去世。中国艺术史的学者和学生们立即就能感受到他的离去所造成的空洞感。高居翰晚年热衷于经营自媒体，所以我们才能及时知道他的研究和写作计划，可惜很多都没来得及以完整的形态呈现出来。但是，仅仅有《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和《山外山》构成的完整的元明绘画史，和《气势撼人》和《画家生涯》两种基于讲座的专论的话，也足以一窥高居翰的艺术史研究的气度。高居翰对于西方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而言，上承罗樾，下启加州学派诸家，是主要研究范式的奠立者。换句话说，他让中国书画研究成为一门严肃的学问。

● 曾昭燏：《曾昭燏文集 日记书信卷》，文物出版社，2013年

继《考古卷》和《博物馆卷》于2009年出版后，《日记书信卷》最终于2013年出版，形成了目前关于这位中国女性考古学家第一人最为完备的文献集成。曾昭燏的考古学和博物馆学论著屡得重刊，但是日记和书信从未如此完整地披露过。而且，由于曾昭燏始终处在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和南京博物院的核心位置上，而两家博物馆公布资料又颇为有限，因此，日记和书信对于早期博物馆史的研究大有裨益。曾昭燏去世前深陷抑郁，连续数月的日记均是千篇一律的治疗、按摩和休息，高度雷同到令人窒息；12月，日记戛然而止，为之一叹。

本报编辑：彭楚裔 徐津阳 卢旖维
编辑部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南校区大钟楼三楼 电话、传真：84111991 邮编：510275
承印：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